



真语文书系·钩沉卷

基础教育·师范 教育·语文教育

——徐特立、林砺儒、朱光潜文选

饶杰腾 编录



 语文出版社

JICHUJIAOYU SHIFANJIAOYU YUWENJIAOYU

基础教育·师范 教育·语文教育

——徐特立、林砺儒、朱光潜文选

饶杰腾 编录

 语文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础教育·师范教育·语文教育：徐特立、林砺儒、朱光潜文选 / 饶杰腾编录. — 北京：语文出版社，2017.10

ISBN 978-7-5187-0517-7

I. ①基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教育学—文集 IV. ①G4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2439号

责任编辑 张 兰
装帧设计 翟菁菁 徐晓森
出 版  语文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
电子信箱 ywcbasywp@163.com
排 版 真语文图书策划工作室
印刷装订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规 格 787mm × 1092mm
开 本 1 / 16
印 张 7.75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-3,000
定 价 20.00元

国家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
项目成果·真语文系列丛书

总 策 划 王旭明

丛书顾问 柳 斌 孙绍振 饶杰腾

钱梦龙 贾志敏 吴桐桢

丛书编委 黄厚江 余映潮 胡明道

李白坚 张赛琴 吴忠豪

王士荣 周 宏

丛书主编 王旭明

执行主编 李世江

前言

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，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。要鼓励地方、基层、群众解放思想、积极探索，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，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、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，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、有机结合。

——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

（2014年12月2日）



自2012年11月23日语言文字报刊开展真语文大讨论以来,我们共收到语文名师、专家、一线老师、教研人员的讨论文章千余篇,微博讨论20,339条,我们在报刊刊登文章两百余篇,并在北京启动了真语文系列活动。一年多来,活动走进了河北石家庄、鹿泉,福建宁德、泉州,山东青岛、即墨,四川成都、绵阳等地,随着讨论的开展和深入,真语文的理念与内涵逐渐呈现并不断完善。据此,我们总结提出,真语文就是语文,是科学的语文观,不是一种流派。科学的语文教育观应该是以语言文字的基本质素为基础,以字、词、句、段、语、修、逻、文为主要训练手段,以追求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为全过程,以促进学生和谐语文生活为终极目标。

语文出版社社长、真语文总策划 王旭明

(《语言文字报》2014年11月28日)

目 录

前言/1

徐特立文选 /1

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 /4

各科教学法讲座 /10

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 /27

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* /30

关于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和教学问题* /31

林砺儒文选 /33

语文教师是经师,也是人师 /36

中国师范教育之检讨 /40

师范教育问题随笔* /64

朱光潜文选 /79

文学与语文(上):内容、形式与表现 /81

文学与语文(中):体裁与风格 /88

文学与语文(下):文言、白话与欧化 /95

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/105

后记/116

JICHUJIAOYU
SHIFANJIAOYU
YUWENJIAOYU

徐特立文选

基础教育·师范教育·语文教育

作者简介

徐

特立(1877—1968)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教育家。原名懋恂，字师陶，又名立华。湖南长沙人。早年受私塾教育，18岁始在家乡教蒙馆。1905年进宁乡速成中学，毕业后即与友人合办梨江高等小学堂。1906年任长沙周南女校、修业学校教师，后赴日本考察教育。首创湖南省教育刊物《周南教育》。为激发青年爱国革命热情，曾在时事演讲中宣读血书，轰动一时。1911年积极推动长沙新军响应武昌起义，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。辛亥革命后，创办长沙师范学校、五美高级小学，亲任校长；又任湖南孤儿院院长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、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教师。五四运动后，在长沙投入反对封建军阀张敬尧的斗争，后到法国勤工俭学，

进本兰省立公学、巴黎大学攻习法语与自然科学，并考察法国、比利时和德国的国民教育。1924年夏回到国内，大力宣传普及义务教育，兼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、县立长沙师范学校和私立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三校校长，推行多种教育改革措施。北伐战争时期，参加中国国民党，拥护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任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长、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兼农村师范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南昌起义，任革命委员会委员、党务整顿委员会委员、第二十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、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农业委员会秘书。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1930年回国后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红色政

权建设,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,创办中央列宁师范学校,兼任校长、教员,后又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。主持制定并颁布一系列教育法规,创办一批列宁小学、中学、师范学校,领导编订教材,培训师资,推进扫除文盲运动。1934年57岁时参加长征。抗日战争后,作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,回长沙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,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40年回延安,历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和党史资料室主任。任新教育学会理事长。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为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,第七、八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。其教育主张主要为:

(1)教育事业系按一定社会形式培养一定人格,为一定社会服务并受整个社会制度的制约;革命教育事业是群众本位的人民教育事业,以劳动大众本身和劳动大众

子女为对象,使工农群众、妇女和各民族享有受教育的权利,为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。(2)人民政府负有办教育的义务,要从中国国情出发,采取多种形式办学,普及教育。(3)受教育者必须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,劳力与劳心并进;要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贯彻到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各方面,培养学生独立处事的能力;德育重在启迪觉悟,力戒体罚;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科学、爱劳动、爱护公共财物,即“五爱精神”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公德;青年要继承革命传统。

(4)革命政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自然科学,培养科技人才;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,经济建设支持教育与科学的发展;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科学技术文化遗产,倡导不同学派论争,推动自然科学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。(5)教师是崇高而愉快的职业;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,提高教师社会地位,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。论著辑为《徐特立教育文集》《徐特立文集》。



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

真正的科学就能够提高人民的自觉，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加深人民的迷惘。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，我们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，而不是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，所以教育科学化就有绝对的意义。

科学是普遍真理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。但如果不民族化，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，就会变成“为科学而科学”。例如过去我们大学采用的外国课本虽然是科学的，但不是民族的，不独其内容不切合中国实际，而其文字也是外国的，所以内容与形式都带着买办性。这就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。又如过去中国的地质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，所调查采集的东西都是中国所固有的。因此它的了解特别深刻，特别有成绩，为欧美学者所不及，这是值得颂扬的。但是那时在中国封建的、买办的、法西斯主义的政权下，经济破产，这种科学在中国就失掉了市场，成为出口货。因此著作写成外国文，又在外国刊物上发表，以作广告，这样就使有民族特性的科学也带上买办性。教育科学化和民族化，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某种程度，但是劳心劳力对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，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，科学才为大众所掌握。我们的政协《共同纲领》第四十三条所说“普及科学知识”，也是要求科学为大众所掌握，也就是科学大众化。所谓科学大众化，不仅是量



的大，其内容和形式也必须适合大众的要求和接受的程度。

科学发展的基础是靠工业经济和民主政治，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开始有了科学，如希腊、印度、阿拉伯，但如今天这样多方面的有系统的科学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。至于社会科学的论著，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真正的科学者，这种科学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代表人物才能创造出来。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剥削压迫诸关系，必然是歪曲的。因为他们否定自然界是物质的世界，不以唯物的科学方法，从事实中阐明自然和社会法则，所以只有在大众把握政权的时代，科学才能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发展。

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人民的政权，即以工农为基础的政权。这一政权萌芽于大革命时代，到了今天已是成熟时代了。它的成效表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就是它的先进的政治和军事及其文化事业。

“九·一八”以来，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把握了军事的、经济的、技术的伟大力量，但在东北的游击战争中，尤其是八年抗战中竟被我们打倒了。近三年解放战争中，由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匪帮也被我们打倒了。经济和武装的物质力量，我们是落后的，但我们却另有一种物质力量，即有组织的大众力量，有深刻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。

马克思说：“物质力量必须由物质力量来打倒。然而理论一旦把握了大众，就要变成物质力量。理论大众化就能够把握大众，而理论彻底化就能够大众化。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。”（《〈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〉导言》）

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我们的科学与资产阶级不同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，而应该被大众把握着，或者科学能通过大众自觉的接受而把握大众。同时要知道科学大众化，不是把科学降低而庸俗化。



科学不能丝毫虚伪，它排斥违背事实的众口一致的俗说。科学要彻底化，不是要粗枝大叶化，而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，即中国习惯语所谓“深入浅出”。庸俗的浅薄的虚伪的科学书籍和科学工作者，自身还不了了，而要求大众了了是不可能的。自身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根蒂中去，仅仅抓住事物的枝叶，而要求了解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。因此提出科学大众化就应该同时反对科学庸俗化。因为庸俗化以科学只要其浅，只看科学浅不浅，而忽略对不对和大众要不要。如果只求它浅，不问它对不对，则有了大众，而没有科学，如果只求它浅，不问大众要不要，则学科学成了无的放矢。无的放矢，则失了运用，成为有知识而无意志。这种非科学的态度，直接给大众以毒害。一切非科学的、似是而非的、俗说的、迷信的横行，必须清除干净，才能一步一步地向着坚实的真正的科学道路前进。

列宁说：“我们不应该从旧学校里采取一大堆十分之九无用的知识，十分之一歪曲的知识，去填充青年的头脑。”又说：“旧学校是一种填鸭式的学校，它强迫学生去吸收一大堆无用的、冗赘的、不能给社会上一点有益处的知识，还要把这种知识困累人们的头脑。”（《青年团底任务》）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科学大众化就应该反对杂乱的、冗赘的、一切无益的、长篇大论的新八股，而精练、具体、明确、深刻化，却是大众化的必要条件。

一九三四年联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对于《中小学历史初步课程纲要》给以下面的批评：“苏联历史纲要充满着大量非科学的、盲目的判断，当编著教科书时，应该是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定义都不苟且的，而该提纲却带有特别不可容许的不整洁性。”又说：“教科书应该周密考虑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断语，而不是不负责的杂志文章乱讲一切。苏联各学校教科书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，提供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。”这里也证明了精练、具体、明确、深刻在科学大众化有



重要意义。

至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，即害怕科学难了解，结果把必需的原则降低而成为庸俗的虚伪的学说。这诚如竺可桢先生在《科学画报》第四期上说的：“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发达，对于好读书不求甚解很有关系。例如现在地方政府（指前国民党政府）做户口农产的调查，农田地图的测量，往往是向壁虚造，敷衍法令，还是明清两朝做八股的态度。这种态度不消灭，近代科学在中国决无生存之理。各大学研究院科学作品固希望其多，而尤其希望能精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固有的八股习气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。”

当科学萌芽时代老八股和新八股都是不能避免的。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中说：“在德国最不行的博士、大学生都创造体系，好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，有些人以为科学的自由，就是在于每人有权著述一切自己所没有学过的东西，杜林先生正是这种假科学的标本典型。”在贫乏的中国科学界，像杜林先生这些人也是有的，以自己还不彻底理解的东西，假充内行，装腔作势，掩盖虚伪，美其名叫“大众化”或“通俗化”，充塞出版商场，吸引无知的读者，使他们不自觉而受骗。这种八股式的、不纯洁的、不正确的科学传授给大众，只能使大众的头脑更糊涂，更抽象化和教条化。

毛主席早就指示过：“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、科学化、大众化了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‘化’者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，有些人则连‘少许’还没有实行，却在那里提倡‘化’呢！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‘少许’，再去办‘化’，不然，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与党八股，叫做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，没有结果的。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，就很要当心，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什么大众在路上碰到他，对他说，‘先生，请你化一下给我看’，就会将起军的。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，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，否则仍然



‘化’不了的。有些天天唤大众化的人，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，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，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。”（引自《反对党八股》）比方，编写科学读物，当然很有需要，但没有与实际相联系，没有解决具体问题，不从老百姓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中吸收科学的东西，结果大众还是大众，科学还是科学，而大众更被科学弄得昏头昏脑。其实科学受冤。过去有些著述的人，自己尚未搞通学过的东西，强不知以为知。如果是一种不成熟的著述，还是慎重一些出版为好，以免误人害己，因与马克思所说“理论彻底化就能够大众化”的原则相违反。马克思说，“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”。就是说抓住其根蒂而放弃其枝叶，抓住基本的原则的东西，放弃其次要的非原则的东西。

我们的大众化是大众基本的知识，基本的技术，基本的方法。大众化的特点是去空、去杂和去孤。所谓空，是没有事实的理论，或没有与理论结合的、又没有原则处理的、与原则无关的事实。所谓杂，是没有联系的知识，无生命的东西，非科学的东西。所谓孤，是单纯化的，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影响，没有来源去路。这些正是庸俗化的虚伪的东西，大众化是毫不容情绝对摒弃的。

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是畸形发展的，因此中国的文化教育也是畸形发展的。今日中国的文化教育还是大部分存在着封建的买办的残余基调。资本主义输入的自然科学，因中国的经济落后，产业不发展，只能停留在纸上的学习，而这种学习又是买办的、非民族化的。如盲目地学习科学，不加以正确的批判接受，不问适合自己的条件需要与否，甚至许多教科书都采用外国原本，这是表现百分之百的买办教育。当然这种罪过是由过去买办性的国民党政府去负责。

在五四运动以来，有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教育，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这发展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。中国的革命工



农分子，文化水平、科学知识虽还没有普遍提高，但革命斗争经验，政治基本认识，已经超过中国任何知识分子，所以在军事政治方面是成熟的，但缺少系统的整理，尚未科学化。我们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，造就了无数的革命干部，一般正规学校是赶不上的。但这不是否定正规学校，而今后要有计划地办正规学校，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人民经济、文化教育等事业。毛主席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说，“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，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。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”。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任务，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、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，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。其次要学习苏联，必须有方法有目的地学习苏联，就要以毛主席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的革命方法，要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。今日我们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方法，同样要以毛主席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的革命方法一样，要使它与中国建设的具体条件相结合。我们学习苏联的目的为实践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们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技术的的方法得到了，以我们民族从来爱好勤劳的工作，加上中国优越的整个地理条件，发展我们的智慧，更能创造一个高度的文明，对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的事业，可谓“事半功倍”，使我们的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，稳步地达到幸福的目的。

再补充一点说，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，而且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，就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也须加以彻底地清算而吸收之。这样一来才能真正科学化。

1949年12月19日

《新建设》第1卷第8期



各科教学法讲座

前言一

我们要讲各科教学法，是根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（包括人力物力在内），来解决我们教学中的具体问题，而不是纯学术的、抽象的、一般的研究。我们写的内容虽然是新的，我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，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，而在形式方面，还是尽量采取民族形式，使它实用方便。还有东西，还必须在学理方面清算旧的、从外国贩来的反动成分。同时我们的教学方法，不是只在教课时候的方法，而是在教课之后，在教课的周围环境，教课时的条件，一切和教学有关的东西，尤其是社会方面，都放在我们的考虑之内，而不是用过去的孤立的课堂教学的方法。但中心内容还是课堂内的，而且按各科的特殊内容的。因此，我们讲的方法，不仅是科学方法，而且要使这个方法能够实现，不停止在纸面上。我们讲的各科教学法是：

一、为什么？

我们先要讲到为谁服务的问题。这一问题，我们政协纲领中已经提出，即民族的，大众的，因之，我们学各科教学方法是為了大众，为了